

彭雪枫在周口

□ 吴敬

三、窦楼之战与白马驿整训
窦楼，淮阳东北部的一个普通村庄，距县城20多公里。豫东沦陷后，各地均呈现混乱状态，地方行政系统多被破坏，日寇、伪军、土匪相互勾结利用，横行乡里。这时，太康有敌骑兵300多名，其西南25公里之洪山庙、四桂村亦有敌骑兵百余人，经常出动；淮阳县内有日伪军200名，汽车7辆；淮柘公路时有敌骑兵及机械化部队出没；淮太公路则有敌汽车及骑兵来往通过。种种迹象表明，此非久留之地。一日上午，驻淮阳东戴集（距窦楼9公里）日军骑兵百余，猛扑过来。

情况有变，部分新战士不免有些紧张。司令员彭雪枫与参谋长张震稍作商议，决定采取迂回包围、侧后突击战术，迎击消灭敌人，扫除东进障碍。命令下达后，彭雪枫迅速来到实施从左侧击敌的三大队七中队。这时，七中队已按照命令集合起来。他向中队长讲明作战任务和意图后，说：“敌人此次来

袭，我军已有准备，他们不可能得逞！敌人虽然凶恶，但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次我众敌寡，我们一定能赢得胜利！”彭雪枫的到来和简短动员，给首次与日军骑兵作战的七中队全体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游击支队司令部遂令各大队迅速做好伏击准备。当日军进入伏击圈后，彭雪枫命令部队猛烈开火，并与张震各操一挺机枪，占领有利地势，掩护部队出击。激战半小时，击毙日军林津少尉以下骑兵10多人，缴获子弹2000多发、战刀1把，残敌慌忙退回据点。窦楼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所谓“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也是游击支队出征后的第一仗，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队伍的士气。

面对新四军游击支队的节节胜利，1938年，日军集合驻睢杞太及商丘各部2000多人，欲对游击支队进行报复性“扫荡”。为了避其锋芒、休息整训，彭雪枫率领游击支队离开睢杞太地区。游击支队从杞

县邢口出以“之”字形行军，冲破敌人的封锁和拦截，到达鹿邑白马驿地区整训。为培养游击支队主力，部队进行了第二次整编，组建了两个团，成立了支队独立营。张太生任支队第一团团长，李跃任政委；滕海清任第二团团长，谭友林任政委；冯胜任支队独立营营长，张辑五任政委。同时，抓紧时间进行军政训练，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做好随营学校工作，积极培训干部；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得到经费和物资上的帮助。这次整训，健全了部队各级组织机构，形成了支队主力。此时，新四军游击支队人员发展到1735名，有步枪1020支、短枪90支、花机枪10挺、轻机枪17挺、重机枪1挺，从而为部队继续东进和创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做好了准备。

白马驿整训成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及后来的新四军第四师发展史上重要的环节之一。从此，新四军游击支队以崭新的

姿态走向抗日第一线，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支劲旅。

毛泽东在1938年12月30日电示彭雪枫：“你们在豫皖苏边地区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去做，必获大效。”游击支队接到指示后，决心更大，信心更足，以更新的姿态投入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斗。

1944年9月10日，彭雪枫在战场上壮烈牺牲，时年37岁。

彭雪枫1907年9月9日出生于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党的优秀干部，是我军的优秀将领，他在周口的抗战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完）



鹿邑早期农民武装——红枪会

鹿邑县赵村乡有个宝北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是桑桥村。桑桥村现有112户，714人，695亩耕地，村民世代农耕。桑桥村历史悠久，历经磨难。从1928年至1933年，六年间遭三次火烧血洗，让人闻之心寒。

在北伐战争结束后，中国的革命斗争转入了低潮，共产党的斗争形势由明转暗。中共河南省委于1927年秋，派共产党员李梅村来到鹿邑，领导人民开展斗争。随后，李梅村成立了中共鹿邑党支部，结交了鹿邑县农民红色革命领袖，红枪会首领张朝聘，努力引导这支农民武装队伍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在李梅村的领导策划下，张朝聘带领红枪会，打击当地土匪恶霸，为农民减租减息。桑桥村村民吴芝芳是鹿邑县红枪会的主要骨干，因在斗争中表现得机智勇敢，受到李梅村和张朝聘的重用。

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李梅村和张朝聘决定，把红枪会发展重点向西转移。在离县城30里路的桑桥村建立鹿邑县红枪会西方分会，发展力量，壮大队伍，配合主力作战。

1928年初夏，李梅村来到桑桥村，任命吴芝芳、吴天文为西方分会的正、副会长，分会下设支会。李梅村在桑桥村住了两天，给大家讲革命道理、讲斗争策略，提出了“不图名、不为利、为百姓，打土匪”的口号。桑桥村村民踊跃参加，邻村的热血青年也纷纷报名，红枪会支会很快接收会员200多人。

眼看红枪会日益壮大，鹿邑县国民政府官员和土豪劣绅便勾结商丘豫东民团第三军军长韩多峰，派兵来鹿邑清剿。1928年11月23日（农历十一月十

二日），韩多峰派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连来攻打红枪会。第二天早晨，天气阴冷，大雾弥漫。骑兵连连长张正发带领60多名骑兵从村东面蜂拥而来，把马拴到离本村200米远的胥家坟里的柏树林中，冲杀过来。敌人在显王河东岸，红枪会在河西岸，双方对峙。敌人开枪射击，红枪会用的是长矛、大刀、土炮，虽然威力有限，但他们毫无惧色，越战越勇，一次次沿冰过河冲向敌阵。见来势凶猛，敌人急忙后退。就这样隔河“拉锯”，往返多次，渐渐地，红枪会伤亡加重，快支撑不住。

这时，吴芝芳急中生智，让吴天文带一部分人，趁着雾障从村南顺河绕到胥家坟，夺其马匹，断其后路。绕行抄后的人到达目的地后，红枪会两路人马齐声呐喊，同时杀出，合力攻击敌人。敌人见大势不好，望风而逃。红枪会紧紧在后追赶，枪扎刀砍杀敌2人，伤7人（其中有骑兵连连长张正发），夺回战马13匹、长枪5支、短枪2支。营长王大胡子闻讯大为吃惊，恼羞成怒，立即下令，全部人马一齐出动，四面合围桑桥村。

当时，天上浓云密布，大雾笼罩，能见度不足十米。红枪会赶走敌人骑兵连后，自知敌人必来报复，决定把全村家眷老小分成两队，向附近建有寨墙掩护的程庄和白杨寺（两村均属现张店乡）转移。

转移群众工作刚刚结束，敌军已冲进村里，见村内无人，便放火烧房。腹部受伤的刘中甫，把流出来的肠子塞进腹部，用腰带扎紧，双手紧握一把“抓钩”，躲在红枪会办公室后门，劈死敌兵1人，劈伤1人。后来，该伪兵开枪把刘中甫打倒在地，其他敌兵闻声赶到，残忍地把刘中甫投入火海，活活烧死。吴清芳腿部受伤后，

因怕连累转移群众，留在家里坚决不走。他从床上强行支撑着站起来，提着一把铡刀向围过来的敌人冲去，连续砍杀2个敌人后，身中六枪，倒地死去。

向程庄转移的群众没走出庄多远，就被敌人追上并团团围住，红枪会拼死抵抗。吴老黑、吴金俭、吴好庚等壮烈牺牲。逃往白杨寺的群众，同样遭到敌人的追杀。刘殿影、刘殿仙、桑小杰奋力拼杀，先后丧命。红枪会用生命保护了群众的安全，让其顺利到达转移村庄。

由于天色已晚，大雾弥漫，敌人不敢恋战，草草收兵。这次战斗共杀敌17人，打伤多人，缴获枪支8支、子弹千余发。红枪会战死11人，全村150多间房屋，一间不剩，全部被烧。

1929年春，李梅村在县城书院与桑桥村红枪会支会代表吴芝芳、吴天文会面，对他们大加褒奖，并指示，要大力发展红枪会组织，广泛吸收群众入会，狠狠打击敌人。

1929年麦收前，中共豫东负责人吴芝圃来到鹿邑，听取李梅村的汇报后，对红枪会大加赞赏。回去途中经过赵村，芝圃在赵村集大隅首西边的刘家茶馆召见了吴芝芳、吴天文，并作了重要指示。

按照两位领导的指示精神，鹿邑县红枪会西方分会发展迅速。在赵村、穆店、邱集、高集、张店、生铁家周围，先后办起了26个红枪会支会，会员发展到3000多人，声势浩大，影响力很广。

当时在鹿邑边界有一股土匪力量。匪首张六，手下有200多人，杀人如麻，无恶不作。群众对其深恶痛绝。

1930年8月5日（农历闰六月十一

日），张六带领众匪，来到赵村集西后刘寨驻扎。红枪会西方分会立即召集附近各支会近千

人，把刘寨团团围住。几次攻打，没有成功。下午两点多，土匪趁其不备，集中火力冲出东寨门，红枪会不防，抵抗不住后退。土匪乘机杀到本村。已经撤回的红枪会奋力反抗，利用巷战、偷袭、围堵等战术，保护全村老小进入青纱帐自保。吴大同、刘广义、吴金生在这次战斗中先后战死，吴连芳夫妇腿部受伤，土匪冲进村里，放火烧房，桑桥村又一次变成废墟。

随后，其他的红枪会支会赶来救援，打死土匪15人，打伤多人，缴获枪支12支。土匪闻风丧胆，向西南狼狽窜窜。

桑桥村从1928年到1933年的六年间，数次遭到恶兵、劣匪、贪官的烧杀血洗，村民团结起来，拼死抵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桑桥村的村史，是反抗旧社会剥削和压迫的血泪史。红枪会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是全国人民反抗压迫、英勇奋战的一个缩影。回顾历史，在共产党员李梅村的领导下，红枪会日益壮大，越战越勇。后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李梅村被调走，鹿邑县红枪会首领张朝聘被捕遇害，桑桥村红枪会孤立无援、走投无路，最后失败了。这段历史告诉人们：“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则一事无成。我们要牢记党的恩情，永远跟党走。”

（吴振江 口述 吴万全 整理）



刘佰明画展在京受好评

本报讯（记者 陈卫东）日前，我市画家刘佰明受邀参加由中国国家画院、收藏快报社和金视传媒联合举办的传承经典系列之“画一品”当代中国画家邀请展。“幽处忘机——刘佰明中国画展”展出的20多幅作品，题材以古树、墨竹、荷花为主，画风清雅、意境幽深，笔墨精到而不失大气，获得到会嘉

宾的一致好评。

刘佰明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周口市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周口市政协书画院副院长。近年来，刘佰明艺术创作收获甚丰，且日益注重中国画坛，成为我市乃至全国花鸟画界一位令人瞩目的优秀画家。

据了解，中国画学会常务副会长孙

克、著名美术评论家刘曦林、北京画院执行院长袁武、著名美术评论家刘龙庭、著名画家郑百重、中国国家画院画院副院长于文江、中国女画家协会主席孔紫、现代工笔画画院院长王天胜等多位著名画家和《求是》《绿色中国》杂志社领导以及数百位书画收藏界知名人士出席此次展览开幕式。参展画家有中国美协副主席

李翔、中国国家画院画院副院长范浩扬、中国画学会（美国）会长赵建民等。数十家驻京媒体对此次展览进行了报道。



袁世凯与近代朝鲜

□ 范阔杰

吴长庆拒绝了袁甲三的好意，回乡召集父亲旧部，盟誓抗敌。朝廷亦因吴廷香劝谏，萌吴长庆世袭云骑尉，安徽巡抚福济令吴长庆督师舒城、庐江团练，吴长庆开始了自己的奋斗历程。

谈到近代史，有很多人把“湘军”和“淮军”并列，视为完全相同的地方武装，其实是一种误读。两者的组建过程及历史作用，有着很大的差别。

湘军是由一名领袖意义的人物——曾国藩，经过招募、训练、征战，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步一步带出来的。在满蒙八旗、绿营失去战斗力的危难时刻，这支地方武装异军突起，成为清政府支撑危局的中流砥柱，也成就了一大批湘籍名臣良将，他们的成长改变了大清官员中满汉的比例，有力地提升了汉族官员在朝廷中的地位 and 话语权，以至于专擅权谋、工于心计的刘老佛爷也不得不对他们有所顾忌。战后的“刺马案”就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明证。

曾国藩攻陷南京，立下剿灭太平天国的首功。长江下游一带富甲天下，向为朝廷最重要的财税保障地。狡兔死无狐悲，已渡过难关的慈禧自然不愿湘军据此要地继续坐大。1868年8月，慈禧任命山东人马新贻为两江总督。马新贻（1821年~1870年），字谷山，回族，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早年追随袁甲三与捻军作战。为感念袁甲三的教携之恩，发达后的马新贻成为袁世凯之父袁保庆在官场中的有力奥援。1870年7

月26日，马新贻阅操完毕，从校场返署途中被刺客张汶祥刺杀，朝野震惊，人皆膛目。“马公新贻被刺，曾公国藩即世。阖城惊悚，谣言四起，公（袁保庆）督帅家人闭门谨守。”这是《容庵弟子记》里的记载，足见当时南京城中的紧张气氛。慈禧对此事件虽满腹狐疑，感慨说“此事岂不甚奇？”但也只是感慨一声而已。慈禧下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查办此案。“刺马案”最终以凶手“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为由，断定“实无主使及知情阴谋之人”，草草收场。次年十月，凶手张汶祥被凌迟处死，剖腹挖心，祭奠一下马总督在天之灵。

相比之下，淮军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了。不只是淮军出现的时间晚，说白了就是一个“乌合之称”。对此刘厚生先生有个形象的比喻：“李鸿章，他根本没有造就什么人才能将领并非与李鸿章有密切的渊源，他只是吃人家煮好的现成饭罢了。”这里不妨将淮军的产生和发展进程总结一下，亦为之后讲述李鸿章与吴长庆、张树声之间尖锐矛盾时做铺垫。

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安徽首府安庆时，清军的江南大营再次被太平军攻破，长江下游的广大区域多为李秀成占据，上海依托英法军队的保护，暂时未被攻破，成为一座孤岛，许多逃难乡绅涌向那里。此时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督办四省（苏、浙、皖、赣）军务，驻扎安庆。寓居上海的京官、逃难乡绅和驻上海的江苏巡抚等士绅面对太平军的威胁，惶惶



难忘小村唱大戏

□ 王天瑞

“挽我来，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余太君我穿宅越院来到前厅，今日是老身我的寿诞庆，一个个膝下承欢满面春风，年少人盼的是立功边境，年老人我喜的是啊一门忠贞……”黄村有3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积极参军入伍，即将奔赴南沙海疆，走向保卫祖国的最前线。村里十多位老人一商量，决定共同出资，请来邻县的豫剧团，唱上三天大戏。

台上，锣鼓敲响，唱腔激昂；台下，不时响起掌声、笑声、赞叹声。《五世请缨》，讲述的是北宋时期，西羌作乱，元帅杨文广边关被困，孟强突围，回朝搬兵。兵部主和，杨府主战。107岁高龄的余太君，带领8个儿媳、两个闺女和孙媳穆桂英等12个寡妇及重孙满堂五代人，上殿请缨，奔赴疆场，平定西羌，得胜还朝。这出戏主题鲜明，故事生动，节奏张弛有度，人物丰满，尤其剧中的穆桂英的扮演者表演得既英武果敢，又不失女性的妩媚，赢得了台下群众的阵阵叫好声。

黄村的老年人都知道，《五世请缨》，早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村里就曾请来剧团演出过。当时，这出戏叫《十二寡妇征西》，又叫《百岁挂帅》。

黄村，名声在外。周围十里八村的老百姓也纷纷说，黄村人有个老传统，爱听戏、爱看戏、爱唱戏，只要一到农闲，锣鼓家伙一敲就开唱了。老人们尤其难忘的是，建国初期，黄村的戏迷们，每年都要在春初和秋末的时候，千方百计筹资，请剧团来村里唱大戏。其实，即使他们不说，大家心里也明白，解放了，天亮了，有吃有穿有住了，再也不过那寂寞、单调、乏味、苦涩的日子了，在这饥歌行进的年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咋能不跳起来、扭起来、唱起来呢！

那个时候，农村没有什么可玩可乐的，群众精神饥渴，只有戏曲文化非常活跃。当地剧团，多是家族、街坊自发组成的，演出报酬很低，只要管吃管住，临走时多少给点粮食或钱就行。黄村到春秋季节该演戏了，就以族长为首组成筹资小组，挨家挨户地按人头或按户头收粮收钱。同时，也接收远近官人、商人、富人的自愿捐助。

当把剧团、演出时间和剧目定下以后，族长就立即派人搭戏台。黄村的戏

台，多是临时搭在村南头。那里有几个连片的打麦场，背村向阳，场面宽敞，周围还有又粗又大的树，年轻人可以爬到树上看戏。搭戏台，横着竖着栽七八排木桩，用长条木棍固定住。然后，在离地四五尺的地方，搭一层厚厚的木板，再用麻绳或铁丝拴牢。最后，在舞台的三面和顶上拉起布帘。这样，戏台就算搭好了。

唱戏前，全村人还有一件大事需要忙——请人看戏。村里唱大戏，全村当然觉得很光荣、很自豪、很有面子，脸上笑、心里乐，走路昂首挺胸。于是，大家就套上骡马、赶起四轮太平车，或推起红车子、平顶车，去请姥爷姥姥、舅舅妯子、七大姑八大姨……

这消息还会像风一样，迅速传遍周围的村庄。于是，很多行业的人也会赶过来——有卖油条的、卖麻花的、卖水煎包、卖胡辣汤的……还有卖橘子的、卖甘蔗的、卖山里红的……还有卖针线的、卖肥皂的、卖雪花膏的……还有做菜刀、磨剪子的、摇拨浪鼓的……虽然他们为唱戏的增色增添了热闹的气氛，但治安员却不让他们进戏场，只能在离戏台很远的南河沙滩上吆喝、做买卖。

在农村唱大戏、看大戏，治安管理很重要。那时没有扩音器，没有麦克风，看戏时都想看得见、听得清，后边的总想往前挤，挤着挤着就乱套了。族长为了大家能看好戏，就成立了治安队，每人发一根长竹竿，分兵把守。开戏前，治安队按先来后到组织进场。进场后，里圈的人坐着，外圈的人站着。族长规定，看戏时，坐着的不能站起来，站着的不准往前挤。如有违犯者，族长会立刻把他赶出戏场。所以，很多人为了占个好位置看戏，有时都顾不上吃饭。

黄村唱大戏，按传统习惯，都是唱三天：头天晚上一场，以后每天两场——上午一场，晚上两场。一听说黄村有戏，附近村里的人都想去看看，有时白天顾不上，就赶夜场。啃个干馍，喝点凉水，匆匆赶去。看罢夜戏再回家，仍然有说有笑。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仔细数数，黄村人看过不少大戏哩——《打金枝》《花打朝》《桃花庵》《清风亭》《白毛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

文化大革命时期，剧团解散了。改革开放后，电视普及了，平时，戏迷们就只好在电视机前过戏瘾了。



分析，李鸿章眼前一亮，信心大增。得到曾国藩任命，李鸿章通过各种关系，将上节提到的皖北子弟兵悉数招到安庆，进行集训，并按照湘军的规制进行改编，筹建淮军。

曾国藩考虑到皖北民团没有经历过大战考验，缺乏打大仗、恶仗的经验，力量亦太单薄，便将程学启、郭松林等数十营湘军建制地调给李鸿章，充实淮军，至此淮军拥有14个营，六七千人。上海官绅筹集18万两白银租用麦李洋行的5艘火轮，分批运往上海，又一支地方武装——淮军登上历史舞台。曾国藩又向朝廷保举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在李鸿章的带领下，这支队伍愈战愈勇，并成为后来平定捻军的主要力量。

由此可知，淮军各部早已分散存在于皖中地区，单独成军更多是依赖曾国藩的引导和推动。淮军在上海的出现，对于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来说意义是双重的，首先从军事上看，淮军参战缓解了湘军的压力，湘军在上游，淮军在下流，对南京形成东西夹击的钳形攻势；其次从政治上看，淮军的出现成功消弭了慈禧太后和满清权贵对湘军一枝独大的担忧和猜忌，分散了各方对湘军的诋毁忌谤。读史至此，曾文正公筹建淮军的举动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意味深长，其博大的胸怀可敬可佩，老谋的心机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待续）

